



魔鬼的抉择

The Devil's Alternative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丁剑 译

Frederick Forsyth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CTIC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魔鬼的抉择

The Devil's Alternative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丁剑 译

THE DEVIL'S ALTERNATIVE by FREDERICK FORSYTH

Copyright:©1979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All-On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鬼的抉择 / (英)福赛斯(Forsyth,F.)著;丁剑译.—合肥:黄山书社,2012.5
(福赛斯作品集)

ISBN 978-7-5461-2806-1

I.①魔… II.①福… ②丁…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7412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1209679

魔鬼的抉择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丁 剑 译

出版人:任耕耘

责任编辑:刘莉萍

特约编辑:陈达凯 金 浩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版式设计:齐 娜

责任印制:戚 帅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230071)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合肥杏花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551-5657388

开本:710×1020 1/16

印张:28.25

字数:360千字

版次: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978-7-5461-2806-1

定价: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PROLOGUE ●

序
幕

如果不是那个名叫马里奥的意大利海员目光敏锐，落难的漂流者可能在日落前就已死去。在被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在他近乎裸露的身体上，暴露在外面的部位被无情的太阳炙烤成二级晒伤，浸在海水里的皮肤则发白变软，像腐烂的鹅的肢翼。

马里奥·科西奥是“加里波第”号上的厨师兼乘务员。“加里波第”号是一艘讨人喜欢的老货船，它从意大利的布林迪西起航，正缓缓向东朝因杰角驶去，目的地是土耳其北部海岸最东边的特拉布宗。它正要去那里装载一批来自安纳托利亚的杏仁。

至于马里奥为什么会在1982年4月的那个上午，在近10天里第一次决定去背风的栏杆处倾倒桶里的土豆皮，而不是通过尾楼的垃圾口，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也许他想暂时摆脱狭窄的厨房里那令人乏味的湿热，外出呼吸一下黑海的清新空气。总之他走上了甲板，慢悠悠地来到右舷的栏杆旁边，用力把垃圾甩进平静而宽容的海面，然后转回身迈开脚步，准备回去工作。他在走了两步后停了下来，皱起眉头，重新回到栏杆处，满脸的迷惑和犹疑。

货船正朝着东北偏北方向直奔因杰角，正午的阳光几乎直射在脸上，马里奥把手遮在眉毛上，从后船梁向远方眺望着。他相信自己在轮船和土耳其海岸间涌动的蓝绿色海面上看到了一些东西，就在南方20海里处。现在又看不到了，他跑上后甲板，从扶梯爬到桥楼侧翼，再次望去。这次他很清晰地看到了，在缓缓移动的浪头里出现了半秒钟。他转过身对着身后通往舵手室的门叫起来，“船长！”

因为马里奥是个毛头小子，船长维托利奥·恩格拉奥颇有些踌躇，但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他知道如果真有一个落难者在那边的海上漂流，他是负责任掉转头靠近去看一看的，并且他的雷达上也确实显示了一个回波。船长花了半个小时把“加里波第”号掉转头，开到马里奥指出的位置，这时他也看见了那个东西。

那是一艘不足 12 英尺的小船，船体很窄。可能是一艘大船上携带的轻型工作艇。小船中部靠前有一块横板，上面有一个固定桅杆的洞。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根本没有这样一根桅杆，或者桅杆因为固定不牢失落了。“加里波第”号停了下来，在波浪里摇摆着，船长恩格拉奥靠在桥楼侧翼的栏杆上，看着马里奥和水手长保罗·隆吉开着摩托救生艇把那艘小船拖回来。从他的高度刚好可以俯视被拖近的小船内部。小船里的那个男人仰躺在几英寸的海水里。瘦弱，憔悴，胡子拉碴，不省人事，他的头歪在一旁，呼吸短促。在被抬到船上时，海员的手碰到他晒脱皮的肩膀和胸部，他只发出了几声微弱的呻吟。

“加里波第”号永远保留着一个多余的舱室，空置起来作为船上的病房。落难者被安排进了这个舱室。马里奥自告奋勇来照顾他，他很快就把这个当做人当他的个人财产，就像一个男孩会着意照顾他亲自从死神手里救回的小狗一样。水手长隆吉从急救箱里找出一支吗啡为那个人做了注射，以缓解他的疼痛，然后他和马里奥两人开始着手为他处理晒伤。作为卡拉布里亚^[1]人，他们对晒伤有一定了解，而且准备了世界上最好的晒伤药膏。马里奥从厨房里拿来了等量的鲜柠檬汁和葡萄酒、醋混合而成的液体倒在盆子里，并从他的枕头套上撕下一块薄棉布，还找来了一碗冰块。他把棉布在液体里浸透，裹上冰块，轻轻把布垫按在那人被严重晒伤的部位，那些地方紫外线造成的伤害几乎深入骨髓。当冰凉的收敛剂使热量从枯萎的肌肤里散发出来时，昏迷的男人身上升起冉冉的热气，他的身子颤抖着。

“发一场烧比因为晒伤休克死掉强多了。”马里奥用意大利语对他说。那个人听不到，即使听见了，也不一定能听得懂马里奥的话。

隆吉回到后甲板船长的身边，这时小船已经被拖了上来。

“有什么东西吗？”他问道。

恩格拉奥船长摇摇头。

“那人身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手表，没有姓名标签。一套没有标签的廉价内裤。胡子看起来也有十天没刮了。”

[1] 卡拉布里亚，意大利西南部城市。

“这里也什么都没发现。”恩格拉奥说，“没有桅杆，没有帆，也没有桨。没有食物和储水容器。甚至连船也没名字。也可能船名已经剥落了。”

“会不会是个被吹到海里的海滨旅游胜地的游客？”隆吉问。

恩格拉奥耸耸肩，“也可能是只小型货船的海难幸存者。”他说，“我们还有两天就到特拉布宗了。土耳其当局会在他醒过来并且能够说话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动身吧。哦，我们还要给那里的船代发个电报，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抵达码头后我们还需要一辆救护车。”

两天后，遇难者被转到了特拉布宗一个小型市立医院的病房里，身上裹着白布床单，仍然不省人事，也无法交谈。

海员马里奥陪着被他救上来的海难幸存者一起乘坐救护车从码头赶往医院，随同前去的还有船代，以及坚持要为那个昏迷不醒的人进行传染病检查的港口卫生官员。在病床边守候了一个小时后，马里奥辞别了他仍处在昏迷中的朋友，回到“加里波第”号上，为船员们做午饭。这已经是一天前的事了，那艘老旧的汽船在当天晚上就起航了。

此刻站在床边的是另外一个人，陪同的是一位警方官员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三个人都是土耳其人，但那个穿着平民装束的矮壮男人能说一口不错的英语。

“他会挺过来的。”那个医生说，“但眼下他的情况很糟糕。中暑，暴晒引起的二级晒伤，从外表看，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身子极度虚弱。”

“那是什么？”平民装束的人指着病人双臂上连着的输液管问。

“生理盐水和浓缩葡萄糖营养液，为了使他脱离休克。”医生说，“海员为他的晒伤采取了降温措施，也许就这样救了他，我们又给他用了炉甘石洗剂来帮助恢复。现在他能不能醒过来就要托真主的福了。”

尤米特·厄代尔是厄达尔瑟米特航运贸易公司的合伙人，也是劳合社驻特拉布宗港的副代理人，“加里波第”号的船代满怀感激地把这个海难幸存者托付给了他。这时那个皮肤焦黄，满脸胡须的病人的眼睑突然跳动了几下。

厄代尔清清喉咙，弯下身子，用他最好的状态说着英语。

“你——叫——什么——名字？”他缓慢而清晰地问。

那人呻吟着左右摆动了几下脑袋。劳合社的男人把头贴近病人倾听着。“佐拉兹恩意，”病人发出微弱的声音，“佐拉兹恩意。”

厄代尔直起身子。“他不是土耳其人，”他断言，“但看来他的名字叫佐拉兹恩意。这大概是个乌克兰人的名字。”

他的两个同伴都耸了耸肩。“我会通知伦敦的劳合社，”厄代尔说，“也许他们会有黑海附近失事船只的消息。”

《劳合社海运日报》是全世界海运从业人员每日必看的报纸，周一到周六发行，内容包括社论、特写、新闻，全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航运。与之配合的另外一个出版物《劳合社航运指南》则记录着世界上三万多艘活跃商船的动向，包括船名、所有人、注册旗帜、建造年份、吨位、近期有记录的船只停泊港口和起航港口等信息。

两份刊物都是在英格兰埃塞克斯郡科尔切斯特市希本大街的一栋综合建筑里出版发行的。尤米特·厄代尔就是向这里电传了特拉布宗港口的商船进出港信息，同时也附上了一条提请同一栋楼里的劳合社海运情报机构关注的信息。

劳合社海运情报机构检查了他们的海运伤亡记录，确认在黑海海域近期没有船只失踪、沉没的记录，甚至延期的都没有，并把这条消息转往《劳合社海运日报》的编辑部。一个副编辑注意到了这条消息，把它加进了头版的新闻简讯里，包括遇难者自己说出的名字。于是这条新闻第二天早上就出现在了报纸上。

多数人在阅读4月底的那期《劳合社海运日报》时，都对这条特拉布宗不明身份落难者的新闻一瞥而过。

但这则新闻却吸引了一双敏锐的眼睛，并使它们久久停留。一个30出头

的男人对这篇新闻产生了兴趣，他是伦敦商业中心区一家特许船舶经纪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是一名深受信任的员工。公司位于一条叫做“铁拐修道士”的小街道上，同事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安德鲁·德雷克。

在仔细看过了那段新闻的内容后，德雷克离开座位来到公司的会议室，在那里查阅了一张显示季风和洋流循环的世界海图。黑海春夏季占主导的是北风，而洋流是从乌克兰的南海岸从西北方向逆时针旋转的，然后向下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海岸，最后再次偏向东方，进入伊斯坦布尔和因杰角之间的航线。

德雷克在草稿本上做了一些计算。一条小船从敖德萨港南部的德涅斯特河三角洲湿地出发，在季风和洋流的帮助下可以达到四到五节的速度，向南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朝土耳其行驶。但三天后它将被带往东方，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朝黑海东岸行驶。

而且《劳合社海运日报》的天气和导航版证实九天前那个地区出现过恶劣的天气状况。在这种天气里，德雷克沉思着，对一个生手而言，小船的倾覆在所难免，结果是失去桅杆和船上的物品，即使它的主人能重新爬回小船，面临的也将是烈日和海风的严峻考验。

两个小时后，安德鲁·德雷克利用他剩下的假期请了一周假，并且得到了批准，但休假只能从下周的周一，即5月3日开始。

德雷克在内心的疯狂骚动中期待着那一周的到来，并且在临近的代理处买好了去伊斯坦布尔的往返机票。他决定到伊斯坦布尔用现金购买去特拉布宗的联程票。经过查询，他确认了英国护照持有人去土耳其不需要签证。但为了保险，他在下班后去维多利亚的英国航空医疗中心办了一张天花预防接种证明。

德雷克之所以这样激动，是因为他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在多年等待之后，他发现了那个他一直在寻找的人。和两天前出现在遇难者床前的三个人不同，他知道“佐拉兹恩意”这个词所代表的国家，他也知道它不是那个

人的名字。床上的男人用母语咕哝出来的词是“背叛”，那是乌克兰语。这意味着他是一个乌克兰游击队的流亡者。

安德鲁·德雷克，尽管是个英国化了的名字，但他是乌克兰人，而且是一名狂热分子。

在抵达特拉布宗后，德雷克首先拜访了尤米特·厄代尔的办公室。他从一个在劳合社工作的朋友那里得知了代理人的名字，他称自己准备在土耳其海滨度假，但对土耳其语一窍不通，可能需要一些帮助。看过介绍信的尤米特·厄代尔获悉他是个懂得写作的人，就对拜访者提出的希望访问当地医院遇难者的请求没有多加过问，欣然提笔为他写了一封致医院管理者的私人介绍信。然后，午饭后一会儿工夫，德雷克就出现在幸存者所在的那间狭小的、只有一间病床的病房里。

当地的劳合社代理人已经对他说了那个男人的情况，虽然已经恢复了神智，但大多数时间都在沉睡，而在无法入睡的时候，他也几乎不发一言。当德雷克进入房间时，病人正闭着眼睛仰躺在床上。德雷克拉了一张椅子坐在床边，盯着病人憔悴的面庞看了一会。几分钟后，那个男人动了动眼皮，半睁开眼睛，然后再次紧闭起来。不清楚他是否注意到来访者正专心地注视着他，但德雷克知道这个人正在清醒的边缘，他缓缓前倾，在病人的耳边清晰地说：

“Shche ne vmerla Ukraina。”

从字面上来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乌克兰没有灭亡”，但如果意译的话，它的含义就是“乌克兰永存”。这是被俄罗斯当局禁止的乌克兰国歌的第一句，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乌克兰人会即刻懂得它的含义。

病人睁开了眼睛，专注地看着德雷克，几秒钟后他用乌克兰语问：“你是谁？”

“和你一样，一个乌克兰人。”德雷克说。

男人的眼睛里布满疑云。

“卖国贼。”他说。

德雷克摇着头，“不，”他镇静地说，“我在国籍上是英国人，在英国出生和长大，父亲是乌克兰人，母亲是英国人。但在我的内心里，我和你一样都是乌克兰人。”

躺在床上的男人顽固地盯着天花板。

“我可以给你看我的护照，伦敦签发的，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如果想骗你，一个大盖帽也做得出来。”德雷克在这里用上了俚语中对苏联秘密警察和克格勃特工的称呼。

“但你已经不在乌克兰了，这里也没有大盖帽。”德雷克继续说着，“你不是在克里米亚被冲上岸的，也不是在南俄罗斯或格鲁吉亚。你也不是在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被救起来的。你后来被一艘意大利商船发现，在特拉布宗上了岸。现在你在土耳其。你已经到了西方。你成功了。”

男人的眼睛盯着他的面孔，明亮而警觉，但似乎有点相信了。

“你能走路吗？”德雷克问。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说。

德雷克对着小房间里的窗户点着头，外面传来的车辆和行人嘈杂声清晰可辨。

“克格勃能伪装成土耳其的医院工作人员，”他说，“但他们不会为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刑讯逼供的人改变整个城市。你能到窗户旁边吗？”

在德雷克的搀扶下，落难者痛苦地挪动到窗户旁，看着外面的街景。

“那些车的牌子是奥斯丁和莫里斯，从英国进口的。”德雷克说，“还有法国进口的标致，西德进口的大众。广告牌上的字都是土耳其语。看那边的广告，那是可口可乐的。”

男人把一只手放在嘴上，用力咬了一下指关节，然后快速地眨了几下眼睛。

“我逃出来了。”他喃喃低语。

“是的，”德雷克说，“你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的名字，”当逃亡者重新回到床上时，他开口说，“是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来自特尔诺波尔。我是个由七个乌克兰游击队员组成的团体的首领。”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诉说了他的故事。卡明斯基和另外六个人一样，都来自特尔诺波尔地区，那里曾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温床，民族主义的余烬在这个地区仍未冷却。他们计划再次反抗强加在他们土地上的俄罗斯化运动，这个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升级，在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已经成为对整个区域乌克兰艺术、诗歌、文学和民族意识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六个月的行动中，他们已经伏击和暗杀了两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莫斯科当局派到特尔诺波尔地区的俄罗斯人——还有一名克格勃便衣特务。然后叛变事件发生了。

不管告密的人是谁，当他们讨论下一次行动计划的那间乡下小屋被佩戴绿色徽章的克格勃特种部队包围时，那个人也一定在冰雹一样的枪火里死掉了。只有卡明斯基逃了出来，像野兽一样跑过灌木丛，白天躲在谷仓和林地里，夜晚才出来行动，带着跳上西方船只的模糊想法朝东南方向的海岸潜行。

接近敖德萨的码头是不可能的。他用田地里的马铃薯和甘蓝充饥，在敖德萨西南部的德涅斯特河口的湿地村庄寻求过庇护，朝罗马尼亚的边界靠近着。最后在夜晚路过一个溪流边的小渔村时，他偷了一条带着分节桅杆和小帆的渔船。他没坐过船，对大海也一无所知。他设法开动了小船，掌着舵，就这样祈祷着坚持着，靠星星和太阳指引方向，乘风朝南方驶去。

完全是因为幸运，他没有遭遇到在近岸水域巡航的苏联巡逻艇，甚至也没有碰到渔船。狭长的木船载着他从海岸雷达的扫描里溜了出去，直至离开雷达的侦测范围。然后他在罗马尼亚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某片海域迷航了，还是朝着南方行驶，但远离了最近的那些航线——毕竟他对这些航线也没什么概念。暴风雨毫无预兆地袭击了他。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及时放下船帆，小船翻了，他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整个晚上紧抓着反转的船体，才没有被大海吞噬。清晨来临的时候，他设法把船翻过来，重新爬了进去。他为了吹吹晚风而脱

掉的衣服，在暴风雨中失落了，几个生马铃薯、用柠檬水空瓶装的淡水、桅杆、舵，也都不知所踪。太阳升起后不久，随着温度的上升，痛苦开始了。暴风雨后的第三天他已经人事不省。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张床上，他在沉默中忍耐着火烧火燎的疼痛，听着他认为是保加利亚语的声音。六天时间里他一直闭着眼睛，不发一言。

安德鲁·德雷克听了他说的话，内心的兴奋无法抑制。他终于等到了数年来一直苦苦追寻的人。

“我要去见见伊斯坦布尔的瑞士领事，看能不能给你弄到一张红十字会的临时旅行证件，”他在卡明斯基开始显得有些疲惫的时候说，“如果能拿到的话，也许我就能带你到英格兰，至少可以用临时签证去。这样我们就能寻求政治避难。我过两天再来。”

在门旁边，他停下了脚步。

“你不能回去了，你知道的。”他对卡明斯基说，“但有了你的帮助，我能回去。这就是我的愿望，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安德鲁·德雷克在伊斯坦布尔待的时间比他计划的要长，要等到5月16日他才能带着卡明斯基的旅行证件飞回特拉布宗。他往伦敦打了个长长的电话，和经纪公司的一个初级合伙人争吵一番后才续了假。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通过卡明斯基，他相信他能实现自己人生中一番雄心勃勃的抱负。

乌克兰在传统上总是被分割成两部分：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这造成了它的衰落。西乌克兰从基辅伸展到波兰边境。东乌克兰曾经被沙皇统治过几个世纪，更加俄罗斯化一些，在同一时期，西乌克兰则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精神和文化比起其他地区显得更加西方化，除了三个波罗的海旁边的州因为太小而无法保持自身民族特点之外，乌克兰人都用罗马字母阅读和写作，而不是用斯拉夫字母，他们主体上是东仪天主教会的信徒，而不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基督徒。他们的语言、文学、诗歌、艺术和传统的发展早于那些北方

来的俄罗斯人。

随着1918年奥匈帝国的崩溃，西乌克兰人试图在帝国废墟上组建起一个独立共和国；与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不同，他们失败了，在1919年成为附属波兰的东加利西亚的一个省。当希特勒1939年席卷波兰西部时，斯大林带领红军从东边打来，占领了加利西亚。1941年，德国又占领了它。希望、恐惧和忠诚，那是一种多么强烈而恶毒的困惑啊！有人寄希望于反抗德国人以赢得莫斯科的让步；另外一些人则错误地认为，如果德国击败了莫斯科，一个自由的乌克兰将应运而生，他们加入了乌克兰师，穿着德军制服和红军作战。还有一些人，像卡明斯基的父亲，进入喀尔巴阡山当上了游击队和最初的占领者作战，然后和下一个占领者作战，然后再次和第一个占领者作战。

斯泰潘·德拉奇当时是来自罗夫诺的一名学生，也加入了乌克兰师。他作为幸运儿在战争中活了下来，并在1945年被英国军队俘获于奥地利。他后来被遣送到英国东部的诺福克做农场工人，当1946年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秘密策划把200万“雅尔塔牺牲者”交给斯大林处置时，他本来是注定要被遣送回国并被处决的。但幸运再次降临。他在诺福克的干草堆后掘倒了一名妇女土地服务队（战时代替男子从事农业劳动）的女孩，使她怀了孕。婚姻成为答案，六个月后，靠着同情心，他被免于遣返并被准许待在英国。在离开农场获得自由后，他利用担任无线电报务员时获得的知识在布拉德福开了一家小修理店，那里是三万乌克兰人在英国的居住中心。他的第一个孩子在幼年死去了，第二个孩子取名为安德里亚，出生于1950年。

安德里亚在父亲膝下学会了乌克兰语，不仅如此，他也熟悉了他父亲的故土，伟大、辽阔的喀尔巴阡山脉和鲁赛尼亚的景色。他继承了父亲对俄罗斯人的厌恶。但父亲在他12岁时因车祸亡故了；他的母亲早已厌倦了丈夫在起居室炉火边和背井离乡的乌克兰流亡者们一起，彻夜谈论着他们的过去，厌倦了他们使用的她永远听不懂的语言，她把儿子的姓德拉奇改成了英国化

的德雷克，名字则改成了安德鲁。这个孩子用安德鲁·德雷克的名字念完了中学和大学，并用安德鲁·德雷克的名字得到了他的第一本护照。

在大学生活里，安德鲁获得了新生。因为学校里也有其他乌克兰人，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语言重新变得流利起来。那时是60年代后期，乌克兰民族的文学和诗歌的短暂复兴倏起倏灭，复兴运动的主力大多已经在古拉格集中营做苦力了。他后来才知道了那些事情，获悉了那些作家的遭遇。70年代来临的第一年里，他阅读着所有能找到的东西：特拉斯·舍甫琴科^[1]的名著，列宁时期和斯大林镇压清算时期的作品。但他看得最多的是被称为“六十年代派”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因为他们在遭到勃列日涅夫镇压前活跃了好几年，他们的呼吁激起了整个乌克兰民族的自豪感。他阅读奥斯达丘、乔尔诺维尔、莫罗兹和祖乌巴等人的作品，并为他们的遭遇伤心，当他读到帕维尔·西蒙南科的诗歌和秘密日记时——这个令人惋惜的年轻鼓动者28岁就因癌症死去，成为苏联国内的乌克兰学生崇拜的对象——安德鲁为他从未踏足的国土肝胆俱裂。

怀着对那片土地和他亡故的父亲的挚爱，他对那些迫害自己心目中这一切挚爱的人，对统治者的憎恶也油然而生。安德里亚贪婪地阅读着国内抵抗运动者们偷运出来的地下刊物，他看《乌克兰先驱报》，上面提及了数以百计的不知名人士的遭遇，他们是惨遭不幸而被人遗忘的人。他们并没有像丹尼尔、西尼亚夫斯基、夏兰斯基、奥洛夫等人一样被莫斯科法庭公开审判。每一个细节，都加深着现在的安德鲁·德雷克，曾经的安德里亚·德拉奇内心的仇恨，对他而言，世界上一切邪恶的化身都可以被简单地称作——克格勃。

他有足够的理智来面对现实，避免老一辈流亡者身上粗糙、原始的民族主义，以及他们对于东西乌克兰的划分。他也拒绝了他们向他灌输的反犹主义，而倾向于接受格鲁兹曼书里的观点，犹太复国主义者、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二者都可以当成乌克兰兄弟。他分析了英国和欧洲的乌克兰流亡者社区，并认识到了其中的四个层次：语言民族主义者，他们只满足于用父辈的乡音交

[1] 特拉斯·舍甫琴科，1814～1861，乌克兰及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画家、诗人和为乌克兰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他的文学作品被视为近代乌克兰文学，甚至现代乌克兰语的奠基者。

谈写作；口头民族主义者，他们终日空谈，从不付诸行动；标语涂鸦者，他们激怒了收养他们的邻里，却对苏联那个庞然大物无法触动分毫；还有实干主义者，他们在来访的莫斯科权贵面前示威，却被特工部门细心地拍照和归档，他们的行动仅能赢得片刻关注。

德雷克排斥上面所有的方式。他从容不迫，温文尔雅，离群索居。他到南边在伦敦找了个办事员的工作。许多做这种工作的人都有一些不为他们的同事所知的隐秘爱好，这个爱好消耗他们所有的积蓄，消化他们的闲暇时光，以至于他们的假期。德雷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悄悄地召集了一个由他认为在做着和他同样事情的人组成的小团体；他搜集了解他们的背景，和他们会面，同他们交朋友，并和他们立下共同的誓言。德雷克也让他们保持耐心，因为他有一个秘密的梦想，就像 T.E. 劳伦斯^[1]说的：“他做梦时都睁着眼睛。”德雷克的梦想是有一天可以给予莫斯科的首脑们沉重一击，让他们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他将刺穿他们强权的围墙，在堡垒内部对他们造成沉重的伤害。

他的梦想始终不曾褪色，卡明斯基的适时出现让他距离梦想的实现又近了一步。当飞机再次滑入温暖的天空，朝特拉布宗飞去的时候，他信心十足，激动非常。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脸上带着犹豫的神情，看着对面的德雷克。

“我不知道，安德里亚。”他说，“我还是不知道，尽管你做了所有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这样信任你。对不起，这已经成了我一生都摆脱不了的生活方式了。”

“米罗斯拉夫，你在接下去的 20 年会了解我，但不会比你已经了解到的更多了。我告诉你的任何事情都是事实。如果你不能回去，那就让我去你的地方。但我一定要有那里的联系人。如果你认识任何人，不管是谁……”

卡明斯基最后同意了。

“有两个人，”他最终说，“在我的组织被摧毁的时候，他们没有波及，没人知道他们。几个月前我还和他们会过面。”

[1] T.E. 劳伦斯，1888.8.16 ~ 1935.5.19，也称“阿拉伯的劳伦斯”，因在 1916 年至 1918 年的阿拉伯大起义中担任英国联络官的角色而出名。许多阿拉伯人将他看成英雄，因为他推动了阿拉伯人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统治中获得自由的理想；而许多英国人也把他当作英国最伟大的战争英雄。



“他们是乌克兰人，也是游击队？”德雷克急切地问。

“是的，他们是乌克兰人。但那不是他们的主要动力。他们的人民也曾经饱受苦难。他们的父亲，和我父亲一样，因为不同的原因在劳改营里待了十年。他们是犹太人。”

“他们仇视莫斯科吗？”德雷克问道，“他们，也，希望反击克里姆林宫吗？”

“是的，他们痛恨莫斯科，”卡明斯基回答道，“和你我一样痛恨。他们似乎受到一个叫做‘犹太保卫同盟’的影响。他们是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组织的。看来他们的指导思想，和我们一样，是面对迫害以牙还牙，而不是逆来顺受。”

“那就让我去联系他们吧。”德雷克催促道。

第二天早晨，德雷克带着两个年轻的犹太游击队员的名字和他们在利沃夫的地址飞回了伦敦。两周内，他通过苏联旅行社预定了7月初去基辅、特尔诺波尔和利沃夫的打包旅游方案。同时他也辞去了工作，拿出所有的积蓄并折成了现金。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安德鲁·德雷克，原名安德里亚·德拉奇，正在准备发动一场秘密的战役，他的对手是克里姆林宫。